

生活？當地人是在什麼樣的脈絡背景下發展出國家想像來的？作者雖略有提及，還不夠深入。

馬健雄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vii，484頁。

在目前的情形下，對於每一個有志於研究陽明學的學者來說，在動手寫作之前也許不得不問自己的問題是：面對從明代典籍到現代學術成果都極其豐富的這一研究領域，自己為什麼值得再寫一本這方面的論著？有什麼新東西是前人所未曾說過而又值得說說的？尤其是，在面對如黃宗羲《明儒學案》這樣對明代學術思想史進行過卓有建樹的總結的經典著作時，我們如何在反思既有研究進路的基礎上進行自己的探索？呂妙芬的這部新著嘗試結合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取徑探討明代最重要的學術運動——陽明學之發展、傳播歷程，對我們回答上述問題頗有啟發，證明我們在這一領域還有話可說。

全書分兩部，共九章。第一部「學派與講會的歷史」分五章：第一章討論學派與講會的歷史，重點析述王陽明個人思想如何在明代中期崛起，成功地建構出一個新學派並快速發展成為明代學界中極具影響力的學術運動，以及這一新學派在當時政治和學術環境中所遭遇的挑戰。在作者看來，「地方性的講會活動是陽明學擴展的關鍵機制」（頁3、21）。這一結論直接導出了本書此後以陽明學講會活動為中心的考察。緊接着在第二章中作者對陽明講會的性質、成員、組織形式、與書院的關係等問題進行概述，認為陽明講會是地方鄉紳士人定期的學術交友活動，在性質上與文人結社相近，而與書院教育不盡相同；並以書院的興建為中心，探討鄉紳與地方官員在地方事務中共同合作以改善地方風俗、整合地方社會的努力。第三至五章則分別考察陽明講會活動在吉安、甯國、浙中地區的發展歷程及其所顯現的地域差異，為呈現陽明學在各地的傳播情況提供了具體例證。作者通過對三地的比較指出，在講會活動進行得最成功的吉安府，陽明學的傳播獲得了較甯國、浙中兩地更大的成就，證實了講會活動這一運作機制對陽明學傳承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並且，因為《明儒學案》早已從思想內涵的角度指出江右王門得陽明正傳，故而上述結論顯得更加不可動搖。

不難看出，從第一章提出論題到第二章的論域界說，最後通過三個不

同個案加以論證的整個過程中，作者都緊緊圍繞講會活動展開，並且認真討論了講會得以開展的社會條件，包括人口、經濟活動、科學考試、基本識字率、城市文化和出版印刷業在內的各個方面，指向一個幾乎無可指摘的結論，即講會活動對陽明學的傳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與此同時，本書對陽明學與政治之間長期複雜的微妙互動，以及這種互動對陽明學本身的傳播和發展所可能具有的影響，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討論尙未能充份。嘉靖中的多次偽學之禁、嘉靖末王學的逐步得勢、張居正的禁止講學、王陽明的從祀孔廟，所有這些政治上的風雲變幻及其社會效應，無疑對陽明學的傳播有着不可低估的影響。如何更加準確的處理政治態勢與講會活動在推動陽明學發展過程中的關係，也應當被納入我們重點思考的範圍。即使從豐富我們對陽明學傳播的多樣性認識的角度來說，對在朝王學的各種政治和文化活動的考察，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對於考察陽明學的傳播史來說，陽明弟子及其後學對陽明本人加以教主化的努力（參考朱鴻林先生圍繞王陽明從祀的系列研究），同樣是不可忽略的要件之一。

題為「思想與實踐」的第二部包括第六至九章，正如標題所顯示的那樣，這一部份重點選擇討論一些能夠同時呈現陽明學者思想、論述與相關組織、實踐層面的議題，這些議題包括：第六章討論陽明學派如何在完全承認道統觀念的前提下，以具體行動為自己在道統系譜上尋求學術的正統性。第七章通過探討講會這種聚集志同道合朋友的組織在學者生活中的物質與精神上的功能與角色，從而揭示陽明學者的講會活動與學者們對朋友之倫的重視之間的雙向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對傳統五倫位序的衝擊。從比較與對話的角度，第八、九兩章分別討論了江左與江右陽明學的思想與實踐。作者以王畿和泰州學派為例，指出某種思想所可能具有的多元影響力和發展方向，以及同一種思想觀念在特殊的歷史情境中可能凸顯的不同面相。同時，從文化競爭與地域認同的角度對江右王門在當時學界中的位置予以再次肯定。總體來說，對於講究知行合一的陽明學來說，注重其思想與實踐之互動的作法自有其合理性。相對於本書的第一部而言，作者在第二部中有轉向學者思想內涵的討論傾向，對於其在實踐層面的開展有所忽略。

此書的最大特點在於，在陽明學研究中，適時地因應了轉向社會史取向的思想文化史研究進路，而這一點在整個陽明學研究中仍然處於嘗試階段。尤其是本書的第一部份最能體現作者一改傳統的觀念史作法，以社會史的視角處理學派和講會活動的歷史，幾乎完全不涉及陽明學思想內涵的討論。這使本書力求在史料運用及某些觀點上超越《明儒學案》的努力部份地達到，

確實能夠展現出地域性講會活動這一新畫卷豐富多彩的蘊含。這種摸索和探路的工作殊非易事，要想從輕車熟路的學譜式的明代思想史研究中拓出一條新的研究思路，其困難包括從具體史料（如新近大量影印出版的學者文集、地方誌書等）的運用到方法論的建立的方方面面，都向我們既有的觀念和思維提出挑戰。即以呂妙芬此書來看，誠如作者本人所說，雖然「在方法論上刻意不採取傳統學術史和觀念史的做法，而試着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提問」（頁7），但最終「畢竟不能忘情於思想內涵」（頁3），因而將差不多一半的篇幅留給了着重於思想內涵的探討。儘管有着個人學術經歷以及特定研究對象的種種限制，也由此可見在這一領域轉換視角之難。

在已有的研究理念下，似乎選擇以明代理學家為主要研究對象往往會抑制問題的展開，因為這批文本無法回答許多現代學界關懷的有趣議題，作者也承認這一點。但值得指出的是，這或許跟作者在本書中的某些處理方式不無關係。比如作者在書中曾經感歎，雖然最大多數的參與者是各地的生員，但其中除了少數後來成名的學者或官員，大部份參與這些講會的生員都無法在歷史上留名，因此在處理作為講會主體的生員群體時，我們其實很難聽到來自他們的聲音，尤其考慮到他們作為陽明學的重要接受者，也是陽明講會的主要參與者時，這意味着他們的參與行動究竟如何推動陽明學成為明代學術主流，以及陽明學在社會上的實際傳播情況，我們的認識仍然將是一鱗半爪（頁76、79）。但事實上，這並不是研究陽明學者單獨面對的困惑，它幾乎可以說是困擾着每一個具有社會史「眼光向下」研究取向的現代研究者的難題。就本書而言，從檢討作者的資料依據來看，似乎我們對此仍然有相當的研究空間可以拓展。從書後的引用書目可以看出，作者最為倚賴的資料基礎是大量的學者文集和地方誌書，兩者的密集交互使用，已經在相當程度上逾出了傳統觀念史研究的範圍，對於考察講學活動、講會組織本身的問題似乎尚無不足，但探索的問題一旦需要進一步深入到更為廣闊的社會層面時，就不免發生上述的感歎了。但我們知道，對於作者所考察的幾個地區來說，豐富的族譜資料實在是一個有待挖掘的寶庫。譬如，同屬於作者重點處理的江右腹心地區，王門學者通過講會和講學在撫州府樂安縣流坑村的鄉族建設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梁洪生重點利用族譜資料所作的相關研究中【〈江右王門學者的鄉族建設——以流坑村為例〉，《新史學》，第8卷，第1期，1993年3月。】就得到了細緻的再現，這至少提示了在陽明學研究中運用譜牒資料的可能。

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講究溫故而知新，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在面對陽

明學這樣的研究對象時，即使我們對既有的學譜式的觀念史進路有着諸多不滿，我們仍然難以完全置他們對心性理氣的討論於不顧，而直接採用時下流行的話語進行解讀。畢竟，是我們需要去專注而費心地聆聽和思考明代理學家們的聲音和關懷，而不是相反。盡可能客觀地看待和理解這些跟我們操持着不同話語的前人，對身處「局外」的我們來說，或許不會比既屬身在廬山的「局內人」，並且又背負着明亡之痛的黃宗羲更困難吧。黃氏在《明儒學案·凡例》中為自己定下一條規矩：「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着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這一力求客觀的態度，也許是我們在進行學術研究時應該努力保持的一份自覺。從以上角度看，呂妙芬在其碩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出版的《胡居仁與陳獻章》（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是一典型的觀念史作品，而在嘗試運用社會文化史視角的本書中，作者時時流露出處在兩種不同治學方法之間的困窘，但正是這種審慎的態度，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點恰恰體現了傳統治學途徑中推陳出新的古老命題！

劉勇

中山大學歷史系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By TOBIE MEYER-FO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xv, 281 pp.**

本書的中文版將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題為《清初揚州文化》（作者中文名為梅爾清）。但是原來的英文書題“Building Culture”包含着至少兩種含義：1）把某一個建築物當做某一個文化圈與文化活動的基地；2）在明清之際動亂之後重新建造精英（elite）文化。讀者必須了解這兩種含義才能夠把握作者的意旨。

此書分為五章。第一章是清初揚州物質與文化重建的背景介紹，包括揚州的地理和歷史以及1644—1645年間的破壞。對於本書的論題更重要的是清初著作常引用的形容揚州的意象：「蕪城」（出自鮑照《蕪城賦》）、「放蕩」（源於隋煬帝的巡幸揚州）和「浪漫」（從杜牧的「揚州夢」）。作者表示本書的主要目的在於探索17世紀下半葉的揚州，而非一般人比較熟悉的18世紀的以鹽商和《揚州畫舫錄》為主的揚州。

第二章到第四章探索清初揚州精英文化的重建。每一章專門論及某一個地點和建築物、與這個建築物最有認同關係的人物、和此建築物聲稱最關鍵